

# 臺靜農在高壓政局下的心境與處世之道

郭晉銓\*

## 〔摘要〕

本文以已故臺灣大學教授臺靜農為探討對象，闡述其來臺初期的生活與心境。不同於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人士，曾遭受三次因共黨嫌疑而入獄的臺靜農，在抗戰結束後一年（1946年）選擇來臺灣教書，原先認為臺灣只是個歇腳處，終究要回家鄉的，誰知道國府遷臺後，在國、共的對峙下，在臺灣一待就是四十年。由於左翼身分的特殊性，戒嚴初期的臺灣讓他步步為營，特別是歷經許壽裳與喬大壯的事件後，讓他完全收起早期那種諷刺社會現實的銳利筆鋒，在臺大中文系教學讀書之餘，除了以書畫創作來排遣心中鬱結，就是致力於學術著作或是寫些無關政局的散文。然而表面噤若寒蟬的他，是否內心真的對這高壓政局無動於衷？從他當時所留下的文字或任何藝術創作中，是否能體察出他對世局的吶喊？除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黨錮諸賢和「遯世無悶」的逸民這兩種處世態度之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本文以臺灣戰後時局為背景，從臺靜農的著作中探討他歷經二二八事件、許壽裳遇害與喬大壯自沉後，在高壓政局下的心境與處世之道。

關鍵詞：臺靜農、許壽裳、喬大壯、嵇康、阮籍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一、前言

1946年秋，臺靜農因好友魏建功（1901-1980）<sup>1</sup>的推薦，接獲臺灣大學聘書，十月抵臺後，正式任教於臺灣大學中文系。<sup>2</sup>時年四十五歲的臺靜農，一時將臺灣作為暫時的歇腳處，誰知一歇就是四十多年，再也沒回過家鄉。對具有左翼背景的臺靜農而言，戰後初期的臺灣，無疑是處處令他「戒慎恐懼」的環境。所謂的「左翼」，在此泛指熱衷於社會改革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人。臺靜農曾是「未名社」<sup>3</sup>以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sup>4</sup>的成員，亦與魯迅、陳獨秀等左翼份子交往密切，其激進的左翼思想更讓他歷經三次牢獄之災，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7日，原因是未名社於三月下旬將俄·托勒斯基著，韋素園、李霽野合譯的《文學與革命》寄往山東省由李廣田、鄧廣銘創辦的「書報介紹所」託售時，被山東督辦張宗昌的特務查獲，未名社被查封，臺靜農被羈押了五十天，後經常維鈞奔走營救而獲釋。第二次發生在1932年12月12日，原因是臺靜農將因共黨嫌疑以繫獄百日的孔另境（茅盾妻舅）保釋出來，當晚臺靜農在北平寓所即遭憲兵搜查，以查獲「新式炸彈」和「共黨宣傳品」為由將之逮捕，入獄十多天，然而真實的原因只是北平憲警不滿其加入北方左聯和保釋孔另境，「新式炸彈」只是友人託寄的化妝品製造儀器，<sup>5</sup>而「共黨宣傳品」只是未名社刊物。第三次是1934年7月26日，

<sup>1</sup> 魏建功，字天行，江蘇省如皋縣人。曾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籌編《中國大辭典》，抗戰勝利後，魏建功受邀至臺灣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推動戰後臺灣的國語運動。見關志昌：〈魏建功〉，收入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1984年），頁475-478。

<sup>2</sup> 當時臺大的學生不多，中文系更是連一個學生也沒有，這是因為臺灣為日本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島內民眾都接受日本語文教育而不諳中文的關係。等到第二年才招收新生，另收兩名大陸轉學插入二年級的學生（葉慶炳與陳詩禮）。詳見林文月：〈身經喪亂——臺靜農教授傳略〉，《蒙娜麗莎微笑的嘴角》（臺北：有鹿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220。

<sup>3</sup> 「未名社」乃於1925年8月由魯迅發起，成立於北京的現代文學社團，以翻譯外國文學為主，兼及文學創作，努力介紹蘇聯文學，曾在1928年4月被北洋軍閥政府以「共產黨機關」罪名一度查封。

<sup>4</sup>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旨在宣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30年3月2日於上海成立，簡稱「左聯」。「左聯」一成立，及遭國民黨鎮壓破壞，而臺靜農是北方聯盟的發起人之一。

<sup>5</sup> 其友人乃同鄉王冶秋的妻子高履芳。

臺靜農又因共黨嫌疑遭北平憲兵逮捕，被押送至南京警備司令部囚禁，入獄半年，經蔡元培、許壽裳、沈兼士、馬裕藻、鄭奠等人竭力營救，於 1935 年 1 月無罪釋放。<sup>6</sup>臺靜農不同於 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人士，其顯明的左翼背景，不得不格外低調。

## 二、臺灣戰後初期時局

根據黃英哲的定義，所謂「戰後初期」乃指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臺灣以後，至 1949 年 12 月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敗退到臺灣為止的期間，而這個期間又可以行政組織重編為界，區隔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1947）和臺灣省政府時期（1947-1949）兩個階段。臺靜農在 1946 年 10 月來到臺灣，抵臺後寫過一首〈憂患〉詩，收入《臺靜農詩集·龍坡草》，本詩在其交付林文月的詩稿中題名為〈寄秋弟〉，詩云：

憂患吾生汝最親，忽聞捕牒遍城堙。高懸網羅驚脫否，迷離音書信未真。  
紫塞料容舒健翼，碧天猶自望修麟。可憐妻子投豺虎，會見金戈覆帝秦。

7

「秋弟」指的是王冶秋（1909-1897），與臺靜農同為安徽霍丘縣人，未名社成員，曾參加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4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馮玉祥處任教員兼秘書，1946 年在孫連仲（1894-1990）部任少將參議，從事策反，事敗在北平被通緝，所謂的「忽聞捕牒遍城堙」即指此事。<sup>8</sup>對於曾繫

<sup>6</sup> 臺靜農三次入獄的經過可見秦賢次：〈臺靜農先生的文學書藝歷程〉，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局，1991 年），頁 8-10。此外，臺靜農之子益堅在 1987 年因公務的關係去了一趟大陸，在南京見到隔絕四十年的四叔，四叔一天帶他去一處名叫老虎橋的地方，說道：「這個地方叫老虎橋，那年你爸爸從北京被壓解到此地，就關在這裡的監牢，足足關了大半年，這是『天牢』，只要當局朱筆一勾，就處決了。」臺益堅回憶起來心有餘悸。見臺益堅：〈身處艱難氣若虹——懷念先父百年永壽〉，收入許禮平編：《臺靜農／逸興》（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00。

<sup>7</sup> 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龍坡草》（香港：翰墨軒，2001 年），頁 43。

<sup>8</sup> 詳見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龍坡草》，頁 44。臺靜農在《臺靜農詩集·白沙草》中，

黑獄的臺靜農而言，此詩可說是感同身受。只是臺靜農寫作此詩的時間點是在剛來臺灣的時候，讓人不由得聯想是否與當時臺灣的政治氛圍有關。

臺灣自 1895 年被割讓給日本統治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對日抗戰勝利回歸中國為止，長達了半個世紀的日治時期。然而戰後初期的臺灣，又在國共內戰的延續下揭開「白色恐怖」的序幕。<sup>9</sup>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與本省人衝突不斷，<sup>10</sup>1947 年 2 月 28 日爆發了大規模抗議遊行，造成外省籍與本省籍人士嚴重的流血衝突，是為「二二八事件」，<sup>11</sup>接踵而來的，即政府一連串的鎮壓行動。據估計，政府整個鎮壓及清鄉的過程中，民眾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受害者多半未經審判即被槍決，甚至不知死於何日何處，帶給臺灣眾多家屬及社會極大的創傷，也造成至今頗為嚴重的「省籍問題」。<sup>12</sup>事實上，隨著國民政府鎮壓「二二

---

有一首〈讀元遺山四十頭顱半白生句有感〉詩：「端居每有遺山感，四十頭顱半白生。鈞黨最憐烹五鼎，陳兵爭欲墜三城。書空未信天能補，畫鬼翻嫌佛有情。青史三千何擾擾，怕聞鶴唳到華亭。」也是在譴責國民黨以清黨的名義濫殺無辜。詳見羅孚：〈老去空於渡海心——紀念臺靜農先生誕生一百周年〉，《臺靜農／逸興》，頁 127。

<sup>9</sup>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頁 17。

<sup>10</sup> 除了生活方式、思維的差異之外，由於國民政府在接收臺灣的過程中出現許多弊端，復原工作不力，導致通貨膨脹，引發不少民怨。關於國民政府遷臺的情況，見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sup>11</sup> 1947 年 2 月 27 日，專賣局查緝員誤傷了販賣私菸的林江邁，引起路人的激憤包圍，查緝員鳴槍示警，卻誤殺一名圍觀者，激憤的群眾隨將警車燒毀，包圍警局，要求交出兇手。2 月 28 日，民眾聚集於專賣局、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抗議，不料憲兵使用機關槍掃射，導致三人死亡多人受傷，此事件經由廣播擴及全島，演變為大規模的抗爭。見戴寶村著，林呈蓉譯：《簡明臺灣史》（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 年），頁 168。關於更詳細「二二八事件」的始末，可參閱褚靜濤：《二二八事件實錄》（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 年）；以及王曉波：《二二八真相》（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年）。

<sup>12</sup> 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悲劇，直至 1987 年 2 月民間才有「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成立，該會首次向國民黨提出平反冤屈、公布真相、定 228 為和平紀念日等訴求。至 1991 年政府始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2 年完成研究報告。1995 年 2 月 28 日臺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碑落成，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4 月 7 日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成立了「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996 年 2 月 28 日臺北市長陳水扁將新公園改為「二二八和平公園」，1997 年 2 月 28 日「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落成，228 也正式定為和平紀念日。見戴寶村著，林呈蓉譯：《簡明臺灣史》

八事件」，臺灣左、右翼的文化人在政治圈、文化界的合作空間大幅度縮減，在國共內戰的延續下，臺灣不僅所有的左翼運動被嚴禁，更在國民政府遷臺後，就算是大陸來臺人士與本土勢力所結合的右翼自由、民主運動也在高壓政治下禁聲。<sup>13</sup> 爲了抑止臺灣左翼思想的發展，1949年5月20日實施全臺戒嚴，限制所有的言論、集會、結社、請願等自由，自此臺灣進入了爲期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1949-1987）。1949年12月7日，中國國民黨正式將中央政府遷往臺北，將臺灣島視爲反共復國的基地。爲了防止共產黨的滲入，1949年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其下屬單位包括國家安全局、警備總部、調查局、黨政機構等，控管所有政治、情報、治安、軍隊等各層面，並針對「叛亂份子」進行肅清行動。1950年韓戰爆發，隨著美蘇冷戰的氛圍，反共情緒更爲高漲，政府根據立院通過的「懲治叛亂條例」與「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持續進行撲滅匪諜的行動，藉此誅殺異己，全臺陷入所謂的「白色恐怖」，在這場政治恐怖之中，受害人高達八千多人，包括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農人……等各階層。<sup>14</sup>

### 三、許壽裳遇害與喬大壯自沉

戰後的臺灣，在國共內戰的延續下，處處瀰漫著肅殺之氣，臺大中文系也不例外，當時系主任許壽裳在「二二八」後依然極力宣傳左翼思想，又專心於《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著述，並把來臺後發表在各報關於魯迅的文章匯集起來，於1947年6月出版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同年10月又出版了《亡友魯迅印象

（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年），頁162-174。

<sup>13</sup> 詳見徐秀慧：〈光復初期的左翼言論、民主思潮與二二八事件〉，收入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05-165。

<sup>14</sup>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可有狹義、廣義之別。就狹義而言，又可分爲二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7年2月，一直延續到1948年底。這段期間，國民政府軍對針臺灣島內的動亂進行武裝鎮壓，執行者以軍隊為主，特務機關為輔。鎮壓的對象以領導或參與協商的菁英階層，以及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群眾為主。第二階則是從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臺到1950年代末期為止。這個階段的執行者以特務機關為主，而軍警武力為輔。鎮壓對象即島內所謂的共黨潛伏分子和臺獨分子。就廣義而言，臺灣白色恐怖年代，實際上應從1949年的四六學生事件算起，迄至1987年解除戒嚴令，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及廢止懲治叛亂條例，甚至修正刑法100條為止。詳見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二期（2007年6月），頁139-204。

記》，同時又在各書刊發表相關文章，例如 1947 年 5 月 4 日發表於《新生報》的〈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毫不畏懼的宣傳魯迅精神和五四精神。此外，同年從 12 月 12 日至 20 日，舉辦七次「中國現代文學講座」，以宣揚五四以來的現代革命文學，講者包括臺靜農、李霽野、李何林……等人。1948 年 2 月 18 日夜，即在「二二八」一週年之前，許壽裳在臺大宿舍慘遭殺害，據警務處的公開報導，許壽裳為宵小所殺，但是李何林否定這種說法，認為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殺。<sup>15</sup>然而無論是何種原因，許壽裳的遭遇讓臺靜農萬般悲痛，據臺靜農 1948 年 4 月所作追悼許壽裳的散文〈追思〉，許壽裳遇害當日，臺靜農和魏建功還有去拜訪他：

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建功兄經過先生寓所，因便走訪先生，未進客廳，就在廊下匆匆說幾句話，先生站在廊上，映著陽光，面色非常溫潤，當時心想，像先生這樣神情，一定要享大年的，誰知道不過十小時以後，竟給我們以永生忘不了的慘痛。<sup>16</sup>

臺靜農與許壽裳有著相當特殊的情感，早在北京時期，二十多歲的臺靜農經由魯迅的介紹初識許壽裳後，始終都無緣長伴，一直到進入臺灣大學，「纔得常在先生左右」。<sup>17</sup>許壽裳為人總是謙沖溫和，但面對不合理的事情，卻又像個熱血青年一樣奮鬥不懈，臺靜農以許壽裳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奔走的事件、抗戰時爭取學術獨立的問題，和主持國立編譯館與籌劃國語等事蹟來說明許壽裳「謙沖慈祥，臨事不苟」的生平。<sup>18</sup>面對心中所敬重長者的逝去，臺靜農有更加沉痛的告白：

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卻是埋在我心裡的悲痛與感激，先生之關心我愛護我，遠在十幾年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纔幾個月。這幾天，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牆望去，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間的小書齋裡，誰知道

<sup>15</sup> 詳見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板畫上的人》（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頁 261-263。

<sup>16</sup> 臺靜農：〈追思〉，《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年），頁 152。

<sup>17</sup> 同前註。

<sup>18</sup> 詳見臺靜農：〈追思〉，《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頁 152。

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sup>19</sup>

臺靜農二度強調陪在先生旁的日子向來不多，好不容易有了長期相處的機會，卻得天人相隔，對臺靜農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事實，甚至是不願接受。而「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更是對時局強烈的諷刺。甚至事隔四十年，臺靜農依然無法忘懷，大陸研究魯迅的學者陳漱渝在臺靜農晚年時對他做過五次訪談，後來為文說：「不知怎的，我第一次拜訪臺老時，他就回憶起了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先生深夜夢中死於柴刀之下的那種被莫名的恐懼壟罩著的日子。」<sup>20</sup>可見，許壽裳的橫禍在臺靜農生命中的確是個「永生忘不了的慘痛」。

後來喬大壯繼任系主任，住在溫州街和臺靜農家相對，臺靜農幾乎天天上門拜訪，當時喬大壯由於對時局的悲憤與內心的孤寂，心情往往不得平復。事實上，在許壽裳遇害之前，喬大壯就日夜酗酒，臺靜農回憶道：

傍晚，我同建功將他送回宿舍，從侍奉他的工友口中，知道他從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麼菜都不吃。燈前他將家人的相片攤在桌上，像工友說：「這都是我的兒女，我也有家呀。」<sup>21</sup>

戰後，由於子女分散各地，喬大壯一人來到臺灣，既無家園，也無安身之地，心中的寂寥讓他不願面對生命。當時已過陰曆年兩三天了，喬大壯連日喝酒，臺靜農和魏建功使盡法子想讓他吃點東西，卻沒有用。不幸的是，許壽裳遇害的事件又在此時發生，喬大壯在人前並無太大的震動，但在許壽裳靈前卻淚流不止。四月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要喬大壯回南京擔任從事防止學生運動宣傳的顧問，為其所拒，但五月時，喬大壯忽然想要回上海，說是要探望家人。離臺前夕，當時是中文系學生的葉慶炳還有去探望他，他正一人獨酌，見到學生來訪，就談起南朝詩人庾信的〈哀江南賦〉來：

他大段大段的背誦賦文，當他背誦到「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

<sup>19</sup> 臺靜農：〈追思〉，《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頁154。

<sup>20</sup> 陳漱渝：〈丹心白髮一老翁〉，《冬季到台北來看雨》（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132。

<sup>21</sup>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93。

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聲音低沉得如在哭泣。接著背誦到「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聲音忽然高昂起來。在燈光下，我們看到他的兩眼都紅了。<sup>22</sup>

回滬後，家人覺其言行異常，時時相伴左右。七月初，由兒媳婦陪同訪老友徐森玉，相談甚歡。誰知喬回家後假裝午睡，趁家人不備時搭車到蘇州太安旅館，寫了遺書後，自沉於蘇州的梅村河。<sup>23</sup>臺靜農在曾紹杰自費發行的《喬大壯印蛻·序》中說：

始與先生接席，溫恭謙挹，出以為古之中庸者，久則以先生跡中庸而實狂狷者，當酒後掀髯，跌蕩放言，又非遁世無悶者，居府援非其志，主講大庠又未能盡其學，終至阮醉屈沉，以詩詞篆刻傳，亦可悲矣。<sup>24</sup>

一個飽受現實折磨的舊時代文人，不堪希望的破滅與憤世，用「酒人何嘗麻木，也許還要敏感些」<sup>25</sup>來形容喬大壯，更令人唏噓。

#### 四、對時局的惆悵

1946年，臺靜農的〈憂患〉詩寫出對王冶秋的擔心，也表達了當下所處的環境。其實，在戰後初期，臺靜農除了寫些學術性的著作外，<sup>26</sup>散文、詩歌是相當少

<sup>22</sup> 葉慶炳：〈四十三年如電抹〉，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74。

<sup>23</sup> 臺靜農在〈記波外翁〉一文中有段感言：「戰後，兒女分散各地，剩下波外翁一人，栖栖遑遑，既無家園，連安身之地也沒有，渡海來臺，又為什麼？真如墮瀾天大霧中，使他窒息于無邊的空虛。生命於他成了不勝負荷的包袱，而死的念頭時時刻刻侵襲他，可是死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更使他痛苦。在臺時兩度縱酒絕食，且私蓄藥物，而終沒有走上絕路。到了上海，又將輓季葦（許壽裳）先生詩『門生搔白首』改得溫和些。……如此種種，都可見他的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情形，最後死神戰勝了，於是了無牽掛的在風雨中走到梅村橋。」詳見《龍坡雜文》，頁101。

<sup>24</sup> 曾紹杰編：《喬大壯印蛻》（臺北：曾紹杰發行，1976年），頁2。

<sup>25</sup>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頁100。

<sup>26</sup> 例如〈兩漢樂舞考〉（1947）、〈屈原《天問篇》體制別解〉（1947）、〈《古小說鈞沉》解題〉（1948）、〈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1948）〈中國文學系的使命〉（1949）等。



見的，這不外乎是迫於時局的壓力，刻意壓抑了心中對政治環境的不滿，否則以他社會寫實的創作精神，一定會作出像〈乙酉冬觀馬歇爾來作迎神曲〉<sup>27</sup>一類的詩作來諷刺當局。然而不諷刺社會現實，並不代表他獨善其身，雖然收起了激烈的筆鋒，卻將人道關懷抒發在回憶類的文字裡。1947年10月寫的〈談酒〉，敘述有一次一位朋友帶來了兩瓶苦老酒，勾起了在青島時期的許多回憶，從他說喜歡苦老酒的原因，即簡單而深刻的隱喻了他當時的心境：

濟南有種蘭陵酒，號稱為中國的白蘭地，濟寧又有一種金波酒，也是山東的名酒之一，苦老酒與這兩種酒相比，自然無其名貴，但我所喜歡的還是苦老酒，可也不因為它的苦味與黑色，而是喜歡他的鄉土風味。即如它的色與味，就十足的代表它的鄉土風，不像所有的出口貨，隨時在叫人「你看我這才是好貨色」的神情；同時我又因它對於青島的懷想，卻又不是游子忽然見到故鄉的事物的懷想，因為我沒有這種資格，有資格的朋友於酒又無興趣，偏說這酒有什麼好喝？<sup>28</sup>

不喜歡蘭陵、金波等名酒；喜歡苦老酒的鄉土風，而將「苦味」與「黑色」視為鄉土風的兩樣特徵，與他早期鄉土小說中所披露小人物生活的苦澀與艱難的意象是一脈相承的。部分學者將這些意象解讀為是臺靜農思念故鄉風情、感受故國溫暖一類的心情，似乎過於主觀。<sup>29</sup>正如臺靜農說的「同時我又因它對於青島的懷想，卻又不是游子忽然見到故鄉的事物的懷想，因為我沒有這種資格」，只能說他藉由苦老酒勾起了在青島的回憶，而回憶間又蘊含了人道關懷，臺大教授羅聯添言：「文

<sup>27</sup> 「冉冉雲旗動，靈車下大荒。千官爭警蹕，列宿拜堂皇。帝篆風雷護，民怨虎豹狂。天威凜咫尺，伐鼓奠椒漿。」此詩在1975年6月9日交付於林文月的《臺靜農自書詩卷》中作〈乙酉冬觀迎神〉，在1984年寫贈施淑的《臺靜農三絕冊》作〈乙酉迎神曲〉，乙酉系指1945年。原本臺靜農親友多不知「迎神」所指為何？八零年代末，臺灣政治環境較為寬鬆，禁忌較少，所以臺靜農晚年使敢將寫定本改為〈馬歇爾來臺作迎神曲〉，舒蕪〈憶臺靜農先生〉：「這其實是一首政治詩，諷刺抗戰勝利後，馬歇爾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資格來華，國民黨要人奔走逢迎的醜態。」詳見《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17-18。

<sup>28</sup> 臺靜農：〈談酒〉，《龍坡雜文》，頁50。

<sup>29</sup> 例如劉小華：〈論臺靜農散文的審美視界〉，《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2002年3月），頁385；施軍：〈人文情懷 學術視野——臺靜農《龍坡雜文》論〉，《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3卷第4期（2002年8月），頁51。

章（指〈談酒〉）似在不經意之間，談著自己曾經飲過、且留下特深印象的苦老酒，亦在不經意間表現『鄉土』文思和人生『悵惘』。」<sup>30</sup>這是臺靜農為文一貫的風格，且看《龍坡雜文》「回憶類」的文章，臺靜農總是能運用片段的事物，依循著他內在的精神與情感，重構出含蓄而深邃的意境。<sup>31</sup>

此外，在 1948 年，臺靜農寫了一行書條幅寄給在廣西桂林師範學院的方重禹（舒蕪），內容為明代陳大樽（1608-1647）的詩【圖，引自《法書集（一）》，頁 10】：

端居日夜望風雷，鬱鬱長雲掩不開。青草自生揚子宅，黃金初謝郭隗臺。  
豹姿常隱何曾變，龍性能馴正可哀。閉戶厭聞天下事，壯心猶得幾徘徊。

陳大樽，初名介，後改名子龍，字臥子、懋中、人中，大樽乃其號，崇禎進士，清兵陷南京後，積極展開抗清活動，後事敗被捕，投水自盡。文學造詣上，《明史》稱他：「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sup>32</sup>然而臺靜農以此詩贈舒蕪，並非欣賞陳子龍的詩文造詣，而是推崇其人格、精神。陳子龍在明亡之後，涉入多起反清復明的抗爭，其 1645 年在故鄉松江舉事，此役轟轟烈烈，卻無奈功虧一簣。清兵平定亂局之後，陳子龍逃往佛寺喬裝成僧，改名信忠，暫避風頭。過不久，他又結合其他志士圖謀再起，不料事發被捕。清軍將其押送南京，遂於途中跳水自盡，時年三十九。陳子龍這種為職志奮鬥不懈、死而後已的精神，是他得以名垂青史的主因。<sup>33</sup>

根據舒蕪的詮釋，臺靜農寫此詩完全是借古人之詩，言自己之志。首聯「端居日夜望風雷，鬱鬱長雲掩不開」乃隱喻當時大陸的解放戰爭和端的政治空氣，次聯「青草自生揚子宅，黃金初謝郭隗臺」則是指自己冷寂自甘和堅負自守的處境。<sup>34</sup>「借了這首詩，表達了他在抑鬱的氣氛和冷寂的生活中，狷介自守，而壯心

<sup>30</sup>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臺北：學生書局，2009 年），頁 422。

<sup>31</sup> 詳見張淑香：〈鱗爪見風雅——臺靜農先生的《龍坡雜文》〉，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 255-299。

<sup>32</sup>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 年），頁 7096。

<sup>33</sup> 詳見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1992 年），頁 45-58。

<sup>34</sup> 詳見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收入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附錄》，頁 32。

未已，渴望風雷之情。」<sup>35</sup>無論身在大陸時或渡海來臺後，政治氛圍無從寧靜，處處充斥著黑暗與險絕，想要有匡濟社會的心思，卻無奈力不可為，在臺靜農身處白沙的時期，即有一首〈山居〉詩：

山深玄豹隱，風急冥鴻高。坐對梅花雨，吞聲誦楚騷。<sup>36</sup>

「玄豹」、「冥鴻」皆有避世隱居、藏而遠害之意，<sup>37</sup>「坐對梅花雨，吞聲誦楚騷」，又以愛國詩人屈原比擬，表達了內心憂國憂民卻無能為力的感嘆，而此詩以「山深玄豹隱」自況，與陳子龍的「豹姿常隱」是同樣的意思。<sup>38</sup>身處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臺靜農何嘗不想操史筆一吐為快，然而若此，生命的變數卻又如何？對於紛紛擾擾的天下事只能「閉戶厭聞」罷了！

## 五、對高壓政局的回應

1948年5月，喬大壯自沉後，臺靜農於8月代理系主任，11月正式受聘為臺大中文系系主任，當時文學院長為沈剛伯（1896-1977）。隨著「白色恐怖」籠罩，身分敏感的臺靜農處處小心謹慎，從他的藝文創作年表可以看出，來臺前期，多著力於學術著作，言志的詩、文創作，在數量上遠不如渡海前，小說更是完全停筆，這最大的原因當然是迫於高壓的政局，許禮平言：

大陸變色，臺灣局勢越趨緊張。先生自知與魯迅既左翼文人關係密切，且早歲以三繫黑獄，隨時可遭不測，變得極為謹慎。<sup>39</sup>

秦賢次言：

<sup>35</sup> 舒蕪：〈讀《龍坡雜文》——悼臺靜農先生〉，《讀書》，1991年2月。

<sup>36</sup> 臺靜農：《臺靜農詩集·白沙草》，頁13。

<sup>37</sup> 漢代劉向《古列女傳·賢明傳·陶答子妻》：「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鹿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又，漢代揚雄《法言·問明》：「飛鴻冥冥，弋人何慕焉。」

<sup>38</sup> 詳見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收入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附錄》，頁32。

<sup>39</sup> 許禮平：〈臺公靜農先生行狀〉，《臺靜農詩集·附錄》，頁79。

大陸淪陷，臺灣局勢日益緊張，政治上瀰漫著一股凜厲之風。這時候的臺靜農，自知他與魯迅與左翼文壇的親密關係，以他戰前三次銀鐐入獄的經歷與紀錄，稍有不慎，隨時都有重入囹圄的可能。因此，他變得格外謹慎，同時也噤若寒蟬。<sup>40</sup>

林文月言：

早年的臺先生是一位成功的鄉土寫實小說家，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的愚昧、閉鎖，黑暗、冷酷，多所諷刺和批判，筆端則常流露出悲憤的情。在四川避戰火時期，所寫的小說與散文，也充分表現著熱烈愛國的心。然而，渡海之後，臺灣的局勢日益緊張，政治上長期瀰漫一股凜厲之風，他以過去與魯迅、陳獨秀和左翼文壇的親密關係，又有三次入獄的經驗，遂變得格外謹慎小心。一九四六年以後的寫作，很明顯地不再有小說，而以論文為主。<sup>41</sup>

三位先生的說法都表露了臺靜農三次入獄紀錄和在國民黨執政下所遭受的危機，此後，除了學術著作，再也看不到他所擅長的短篇小說和譏刺現實的散文，甚至在四十二至四十四年間，四十八至五十二年間，一篇文章也不曾發表過。<sup>42</sup>翻閱《龍坡雜文》，三十五篇文章中，僅有〈談酒〉、〈記《銀論》一書〉、〈《陶庵夢憶》序〉的寫作時間較早，其餘文章多集中在七、八零年代，可以說在戒嚴時期的前半期是極少文學創作的。事實上，1949年後臺灣在國民政府「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高壓政策之下，首當其衝的就是知識分子，有學生團體被強迫解散的，也有大學教授被派員抄家的，甚至在1951年，臺靜農還被臺灣文學團體指責為「左派同路人」，若對反共不表態，即該送綠島管訓。<sup>43</sup>在時局的多重壓力下，臺靜農頗為緊張，所幸在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的時候，以其社會地位和政界關係，挺身申言，凡要抄查臺大教授住宅者，必須由他在場作旁證，如此雖暫免風波，但臺靜農還

<sup>40</sup> 秦賢次：〈臺靜農先生的文學書藝歷程〉，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15。

<sup>41</sup> 林文月：〈身經喪亂——臺靜農教授傳略〉，《蒙娜麗莎微笑的嘴角》，頁226。

<sup>42</sup> 詳見秦賢次：〈臺靜農先生的文學書藝歷程〉，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15。

<sup>43</sup> 詳見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頁465。

是命子益堅將自重慶帶來的《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俄國文學作品在後院付之一炬。<sup>44</sup>在「反共文學」被大力提倡的時代，<sup>45</sup>臺靜農選擇沉默，收起以往的鋒芒，依張淑香言，即「由狂飆式的風雲際會而至退盡絢爛，以風雅自沐，淡泊自守」，<sup>46</sup>以致在未來主持系務的十多年間沒有出任何「差錯」。按姜一涵的說法，臺靜農不是單靠命運，而是憑藉了他的智慧，也就是「知幾」和「退藏」的智慧，將其「左傾」的餘蔭藏起來，使他從一個以文字譏刺現時的新文學家，轉變為一個古典學者和傳統書畫家，最後以古典書家聞名於世。然而他並非使自己麻木、無感，而是將所有知覺與不平隱喻於抒情散文、詩歌、書畫等藝術形式之中，再加上身負臺大中文系主任這個頭銜，言行處事不得不更加低調了。

## 六、「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感傷

李敖曾寫過一篇〈我最難忘的一位教授——臺靜農的人格與學格〉，文中對臺靜農來臺後的處世之道有強烈的批評：

臺靜農的牢獄之災，使他嚇破了膽，從此「不幹了」，以詩酒毛筆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罷了，但他卻逃得很無聊很無恥，他一九八四年與梁實秋同上台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一九八五年又與日本

<sup>44</sup> 詳見臺益堅：〈身處艱難氣若虹——懷念先父百年永壽〉，收入許禮平編：《臺靜農／逸興》，頁98-101。臺益堅在文中還提到：「八六年七月父親來美，我們在舊金山中國城吃中飯，飯後走進一家中文書店，本來是隨便看看，卻無意間發現一本《魯迅和他的同時代的人》，只有一本上冊，我看目錄中正好列有父親和許多他的老友，就買下了送給父親，他直覺地說：『這書不方便帶回臺北吧？』我忍不住說：『你現在就是捧在手上，誰也不會過問你的。』他終於帶回去了，但是在書面上他仍加了一層封皮。」

<sup>45</sup> 王德威認為「反共文學」的特色就是連篇累牘的控訴共產暴政、濫情誇張的情節、兩極化的角色設計、簡單不過的道德教訓，這樣的「反共八股」在執政者眼中，卻是打擊共產邪惡的利器，這種文學的「好處」在於它可以一再重複，成為不斷回收再製的資源，根據保守的估計，五零年代的臺灣，可以被貼上反共標籤的作家超過一千五百位，生產了將近七千多萬字的文學。詳見王德威：《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頁30-31。

<sup>46</sup> 張淑香：〈鱗爪見風雅——談臺靜農先生的《龍坡雜文》〉，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256。

人字野精一同上臺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sup>47</sup>

這樣的評語對許多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古遠清對李敖的評論作了回應：

李敖希望臺靜農像自己那樣，向國民黨作毫不留情面的攻擊，或在寶島不願當局禁令，繼續大張旗鼓宣傳魯迅，那臺靜農還能在臺灣大學站穩講臺嗎？委曲求全誠然不是戰士的風格，但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為戰士，不做戰士，做一個歇腳者，借臺灣這個歇腳的地方培養一些文學人才，總可以的吧。30年代開始經歷動亂，九年後來臺歇腳的臺靜農，所選擇的正是後一條路。<sup>48</sup>

關於臺靜農在臺灣高壓政權下的處世之道，或許我們可以跳脫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無論是正面或負面），回歸到作者本身的文字來找答案。

大約在 1956 年前後，臺靜農寫了一篇不到兩千言的〈庾信的賦〉，論述〈哀江南賦〉的寫實精神與承先啓後的地位。此文一直到 1992 年 6 月才排印刊於《臺大中文學報》第五期，手稿影本收入《臺靜農先生輯存遺稿》。在戰後渡海來臺人士的心中，對庾信的〈哀江南賦〉始終有著特殊情感，對臺靜農而言，讀此賦未嘗不心有同感。梁朝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但西魏卻攻破江陵，梁元帝出降被殺，庾信懷著亡國巨痛被扣留於西魏，雖然他未能堅守民族氣節，在北朝做了官，但也因為如此，心中的矛盾、哀慟，以及對故土的思念，都沉重表現在〈哀江南賦〉中，臺靜農言：

這一鉅制，卻非抒情小賦可比，他寫出了他所處的整個的時代，江左偏安，侯景叛亂，江陵瓦裂，朝士俘虜，人民塗炭，凡所經見的政治得失，社會動亂，皆以極沉痛的感情與嚴肅的態度寫出。<sup>49</sup>

---

<sup>47</sup> 李敖：〈我最難忘的一位教授——臺靜農的人格與學格〉，《李敖大全集·二十集·我最難忘的事和人》（臺北：成陽出版社，1999年），頁107。

<sup>48</sup> 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頁72。

<sup>49</sup> 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編輯委員會：《臺靜農先生輯存遺稿》，頁193。

經歷多次動盪時局的臺靜農以自己的口吻描述〈哀江南賦〉內容，彷彿親眼所見，心有戚戚焉。自古以來文人往往借歷史事件、典故或文學作品來隱喻自家身世，當臺靜農在探討文學史上的人物時，是否有類似的操作手法？

1956 年末至隔年初，臺靜農有兩篇魏晉文學的相關研究著作，即〈魏晉文學思想述論〉與〈嵇阮論〉。前者原載 1956 年 12 月的《文學雜誌》，後者卻未發表，1989 年二文皆收入《靜農論文集》。〈魏晉文學思想述論〉文分六節：一、「漢末士大夫兩種人生態度」；二、「名法政治反應於散文方面的風格」；三、「老莊與玄學並存的新思想」；四、「嵇康、阮籍」；五、「老莊玄學與佛教玄學合流的清談」；六、「自利主義清談家人生觀」。〈嵇阮論〉文分八節：一、「漢末知識分子『黨錮』與『逸民』」；二、「魏晉之際何晏王弼以『老莊為體儒學為用』」；三、「嵇康阮籍以老莊思想的放達藉以避禍」；四、「嵇康阮籍的政治關係與政治意識」；五、「嵇康以『剛腸疾惡』被殺」；六、「阮籍自汙汙人倖免於死」；七、「兩人並受盛名之累」；八、「放達流風及於後世」。<sup>50</sup>

〈魏晉文學思想述論〉大方向的推論魏晉文學思想演變過程，大致內容是曹操名法政治思想影響下所產生清峻、通脫的文學風格，其反映出來的文體便是校練名理的議論文。而何晏、王弼合儒、道為一的新思想體系便充實了此時在思想上的空虛，同時又出現了嵇康、阮籍藉老莊玄學逃避現實的文風與抗議禮教的生活方式。魏晉之際，佛教玄學與老莊玄學合流所產生的清談之風，在東晉之後，卻形成「苟生之為我論」的絕對自利主義，早已失去原本的玄學思想了。<sup>51</sup>全文層層推論，講述魏晉文學思想的脈絡，客觀嚴密。然而此文在《文學雜誌》發表後不久，卻又寫了〈嵇阮論〉，他自言：

關於文學者，有〈魏晉文學思想述論〉，而意有未盡，乃寫〈嵇阮論〉，兩篇可比照觀之。後人多喜魏晉襟度，實因生值亂朝，不得已託跡老莊，故作放誕，有所逃避爾。<sup>52</sup>

羅聯添言〈嵇阮論〉旨在補充〈魏晉文學思想述論〉中第四節述論嵇康、阮籍內

<sup>50</sup> 臺靜農：《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頁 81、93。

<sup>51</sup> 詳見臺靜農：〈魏晉文學思想述論〉，《靜農論文集》，頁 81-92。

<sup>52</sup> 臺靜農：《靜農論文集·序》。

容之不足。<sup>53</sup>看似如此，但不排除有進一步申論的可能：在約莫六、七千言的〈魏晉文學思想述論〉中，「嵇康、阮籍」一節就佔了約二千言，是六節中篇幅最長的一節，但寫完後卻又「意有未盡」，另外作六、七千言的〈嵇阮論〉來探討嵇康跟阮籍，可見這兩人深得臺靜農重視，且文中多論及二者的為人和政治意識，是頗具批判性的文章，與前文客觀談論魏晉文學思想脈絡演變的論述方式比較起來，〈嵇阮論〉顯然具有較多的主觀論點。

在〈魏〉文中，篇首提到漢末的士大夫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黨錮諸賢，和「遯世無悶」的逸民。「兩者同是出發於儒家的人生哲學，又同是由於宦官集團的政治迫害而形成的。」<sup>54</sup>在〈嵇〉文中，進一步論述了這個觀點，他提出《後漢書》值得注意的兩列傳，即〈黨錮列傳〉與〈逸民列傳〉。〈黨錮列傳〉的人物如范滂、張儉等，明知時事不可為，偏要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也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逸民列傳〉如梁鴻、龐公等，既知時事不可為，於是長住山林，不求聞達，也就是所謂的「遁（遯）世無悶」、「獨善其身」一類的人物，這兩者都是屬於儒家的精神，雖然生活態度積極、消極不同，但都不甘心於暴君的統治。臺靜農在說明了這兩種人物的差別後，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言論：

而逸民一流的人物，在一般人看來，總以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熱的權勢之下，能以冷眼及唾棄的態度，也不失為沉默的反抗。在中國歷史上，凡具有正義熱忱的知識者，他們生活於動亂時代的政治態度，不是以熱血向暴力死拚，便是以不屑的態度深隱起來。能不以儒家的思想來決定生活態度的，則只有魏末晉初受老莊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嵇康、阮籍便是這一派知識分子的代表。<sup>55</sup>

看來知識分子面對暴政的統治，除了拚死抵抗和遁世深隱兩條路外，似乎還可以歸納出別的處世之道。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官至中散大夫，雖未參與國家大政，卻是魏廷朝士；而阮籍是曹魏建國元勳阮瑀之後，政治態度也是傾心曹魏的，二者同為士林眾望，不投靠司馬政權，勢必要遭受迫害。身為著名的知識分子又

<sup>53</sup> 詳見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頁480。

<sup>54</sup> 臺靜農：〈魏晉文學思想述論〉，《靜農論文集》，頁81。

<sup>55</sup> 臺靜農：〈嵇阮論〉，《靜農論文集》，頁93-94。



是朝中之士，面對新舊政權的替換，不是作臣僕，便是抗拒，不然就遁隱起來，然而對嵇、阮二人來說，既然不願面對新政權，何不遁隱山林呢？答案依然是不行，因為「作司馬氏的臣僕，絕不可能；抗拒呢，更無此力量；隱遁呢，則一時人望，忽然隱遁起來，那野心家的猜忌又必然的隨之而至。」<sup>56</sup>換言之，以他們二人的身分地位，「隱遁」等同「抗拒」，於是這兩人走向了老莊的自然主義，藉由老莊思想來幫助他們因應時局的困擾，他們「寧可戕賊自己，而以放達的生活，嘲笑禮教，冷視權威，同時他藉此偽裝以保全性命；那麼，他們的頹廢行為，是武器，也是煙幕。」<sup>57</sup>雖然如此，兩人的命運究竟不同，嵇康是個「剛腸疾惡」的人物，卻假借玄學來隱藏內心的激進思想，這極端矛盾的心理衝突，終於為他招來災禍，臺靜農強調：

他（嵇康）究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文人之於政治，往往認識不夠，熱情多於冷靜，主見勝於客觀，既不能有抗爭的勇氣，又沒有容忍的氣度，又要從夾縫中尋覓自全之道。即使暫時找到了避難所，終不免為人所擊倒。<sup>58</sup>

「剛腸疾惡」的嵇康，不免走回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精神，在無可逆的時局下終究難逃災禍，他為了替被人誣告的好友呂安作證，卻連同被收押下獄，判處死刑。至於阮籍呢？則是「自汙汙人倖免於死」，<sup>59</sup>他表面是投靠了司馬政權，內心卻苦不堪言，只要遇到司馬政權的徵招，馬上大醉多日，臺靜農形容阮籍如屈原筆下漁父所說的「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sup>60</sup>以是自汙汙人，使權貴失色，所有的言行舉止，都是為了讓人覺得他任誕而不能治事，臺靜農言：

他（阮籍）越麻醉自己，內心越痛苦，別人看他是放達，實際上他是在肢解自己。尤其是賣身投靠的何曾、鐘會等，時時刻刻的要陷害他，處心積慮地要毀滅他。嵇康說他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只是好飲酒，以致禮法之

<sup>56</sup> 同前註，頁 96。

<sup>57</sup> 同前註，頁 96。

<sup>58</sup> 同前註，頁 97。

<sup>59</sup> 同前註，頁 99。

<sup>60</sup> 同前註，頁 100。

士把他當仇人，所幸有司馬昭保護他。<sup>61</sup>

阮籍終究爲了保存性命，最後還是爲司馬昭寫了篇〈勸進文〉，讓司馬昭得以假裝當晉王是被士林勸進的，是眾望所歸的，臺靜農說這是阮籍身上「洗不清的汙泥」。

<sup>62</sup>

讀完〈嵇阮論〉，我們不妨設問：當臺靜農在 1948 年寫陳大樽詩寄給舒蕪時，舒蕪一看便馬上明白臺靜農是在「借古人之詩，言自己之志」，那麼臺靜農寫〈嵇阮論〉是否也同樣有借古喻今的想法（又或者是不自覺的流露）？臺靜農早年的小說和在四川時期發表的散文，往往是站在明確的立場，以批判時局或激刺社會現實作爲出發點，來臺後不作小說與時文，卻在這篇論文中感受到他昔日慣有的激刺筆鋒。顯然地，〈嵇阮論〉比〈魏晉文學思想術論〉具有更多主觀意識的批判成分，這或許也是〈嵇阮論〉從未發表的原因之一。我們不可否認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治氛圍與歷史上數次受高壓政權統治的時期有幾分類似，而正始時期就是其中一段。「白色恐怖」在五零年代，國民黨以特務機關爲主力執行肅清行動，逮捕或槍決島內所謂的共黨潛伏分子和臺獨分子。<sup>63</sup>像許壽裳在「二二八」之後，依然積極宣傳左翼思想，致力於魯迅和蔡元培等相關著述，此即典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知識分子，而這「以澄清天下爲己任」的態度，所付出的代價只有性命的犧牲。喬大壯呢？他雖然「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但他又無法「遁世無悶」、「獨善其身」，他像阮籍那樣的喝酒卻達不到「逃避現實」的境界，以至於要「毀掉他自以爲多餘的生命」。<sup>64</sup>面對時局的壓力，又無從隱遁，左翼背景的臺靜農與心懷曹魏的嵇、阮一樣，不斷在尋求因應艱難時局的處世之道，臺靜農認爲嵇康、阮籍的老莊思想是「用」而非「體」，只不過是避禍的手段而已，他們雖走放誕的路，卻禁止自己的兒子因循他們。阮籍的兒子羨慕通達，不拘小節，阮籍要他不要這樣；而嵇康，在他兩千言的〈家誡〉中，盡教兒子學些如何應對長官之類的庸俗小節，臺靜農言：

<sup>61</sup> 同前註，頁 100。

<sup>62</sup> 同前註，頁 101。

<sup>63</sup> 詳見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二期（2007 年 6 月），頁 139-204。

<sup>64</sup>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頁 94。

他們（嵇康、阮籍）對兒子的話，似乎還不能脫去庸俗的儒家的人生哲學，這是由於本身經驗的亂世生存的艱苦，遂以最庸俗的處事態度教訓兒子，這也就是諸葛亮所說的「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意思。<sup>65</sup>

嵇康、阮籍何嘗不想一展抱負，只是執政者非心中所屬，對他們而言，不為官祿所誘，風骨重於一切，這確實是他們為後人所敬重之處。然而教導孩子的處世哲學，卻是落得「苟全性命於亂世」。這也是無可奈何，畢竟不是誰都要當烈士，也不是誰都能當烈士。能夠像阮籍那樣，對司馬政權表面的歸順，又能不違背良知、原則，大概是知識分子在高壓政局下最折衷的處世哲學了吧！臺靜農早年當然是屬於激進的行動派，雖然他不見得是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那一型（因為他很有可能是「知其可為而為之」），結果卻帶來三次牢獄之災，甚至差點慘遭殺戮。幾經喪亂，熬過抗戰時期，終於來到臺灣這個島嶼，對他而言，未嘗不是一個新的開始，卻又面臨「白色恐怖」的紛擾，臺靜農沒有選擇歸順、臣服，而是「與世推移」的來因應國民黨政權，李敖說他「嚇破了膽」、「從此不幹了」，但從他擔任系主任時聘請聶華苓來教授現代文學一事，卻足見臺靜農剛毅的風骨與勇氣。<sup>66</sup>「臺靜農講中國文學史不教唐詩宋詞而專教屈原，講文學史對嵇康阮籍、魏晉名士情有獨鍾，所謂痛飲酒、談離騷，可為名士，這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寄託，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sup>67</sup>停筆於小說、散文創作的時期，

<sup>65</sup> 臺靜農：〈嵇阮論〉，《靜農論文集》，頁96。

<sup>66</sup> 聶華苓曾說：「臺先生在我一生最黯淡的時候扭轉了我的生活。」1960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因批評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而被迫停刊，雷正、傅正等四人因莫須有的「叛亂罪」而被捕，當時擔任文藝欄主編的聶華苓雖無牢獄之災，但有特務跟蹤，有警察深夜上門盤問，親友也因此絕跡。聶華苓不和任何人來往，以免牽連別人，也不給特務任何騷擾的線索和理由。從此，他如同生活於孤島，而孤島外，盡是洪水猛獸。就在這時，臺靜農來訪，聶華苓回憶道：「他要在臺大開一門現代文學的創作課，必須找一位作家去教，問我是否願意去。我驚訝得不知如何回答。不僅因為臺先生對我這個寫作者的禮遇，也因為我知道臺先生到臺灣初期，由於和魯迅的關係，也自身難保；而我那時在許多人眼中是個『敬鬼神而遠之』的人。臺先生居然來找我！我當然心懷感激地答應了。臺大教室裡年輕的臉、談藝之樂，立刻將我帶進一個廣闊的世界。我的恐懼並全消了。我又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詳見聶華苓：〈悼念臺靜農先生〉，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80。

<sup>67</sup> 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頁76。

這篇〈嵇阮論〉實為其心中對高壓政權的「吶喊」。

## 七、結語

臺灣的戒嚴時期長達三十八年，臺靜農的前半生在喪亂、流離中度過，來臺後又面臨國民政府的高壓專政，偏偏高壓專政的目的又是為了遏止共產黨勢力，左翼背景的臺靜農，在大陸的時候還有四處奔走以換取生存空間的可能，在臺灣，是完全行不通了。政府要控制人民的言論、思想，知識分子往往是首當其衝的控管對象，如果不當心言論，後果很容易像許壽裳那樣，以生命作為代價。而不發激烈的言論，不做熱血的抗爭，就勢必要有一顆曠達遁世的心，否則又要像喬大壯那樣心懷憂憤，走上「阮醉屈沉」的路。對時局無能為力的臺靜農，借古喻今成了渲洩情緒的方式，這「鬱鬱長雲」不僅是世道的陰雲，更是心中無限的悵惘，無奈「豹姿常隱」、「龍性能馴」，所有嫉惡如仇的反抗精神，終究要隱藏於順應時局的外表下，也莫怪臺靜農對於能置生死於度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歷史人物，總有分特殊的情感。臺靜農早年的《地之子》、《建塔者》兩本小說集，以銳利筆鋒發不平之鳴，《地之子》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描繪小人物的悲哀，因為這本小說集，臺靜農被視為成功的鄉土小說家。而《建塔者》則是對軍閥的強烈抗議，「你知道，我們的塔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我們期望這塔堅固的永久，不用泥土和頑石，毫無疑惑地將我們的血凝結起來。」<sup>68</sup>強烈的語鋒反映著建國初期軍閥橫行與社會動亂帶給人民的無數災難，所謂的「建塔者」就是為了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之塔，不畏強權與軍閥抗爭的愛國分子。試想，在戒嚴時期的臺灣，若出現像這樣充滿左翼思想的激進文字在藝文創作中，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放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隱藏反抗暴政的性格，運用嵇、阮的智慧，以老莊為「用」，放棄激進的手段而選擇在臺大教書，培育優秀的學者，做一個繼往開來的教育家、藝術家，何嘗不是另一種「澄清天下」的方式？

<sup>68</sup> 臺靜農：〈建塔者〉，《建塔者》（臺北：遠景出版社，1990年），頁83。

## 引用文獻

- 王德育：《臺灣藝術——現代風格與文化傳承的對話》，臺北：北市美術館，2004年。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出版社，1992年。
- 尼可拉斯·魯曼著，張錦惠譯：《社會中的藝術》，臺北：五南書局，2009年。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何謂台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雄獅美術月刊社，1997年。
- 林文月、郭豫倫編：《靜農書藝集》，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 \_\_\_\_\_：《靜農墨戲集》，臺北：鴻展藝術中心，1995年。
-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
- 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論述》，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
- \_\_\_\_\_：《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高尙仁：《書法藝術心理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年。
- 許禮平編：《臺靜農／逸興》，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年。
- \_\_\_\_\_：《臺靜農法書集（一）》，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年。
- \_\_\_\_\_：《臺靜農法書集（二）》，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年。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
- \_\_\_\_\_：《地之子》，臺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
- \_\_\_\_\_：《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臺北：聯經書局，1992年。
- \_\_\_\_\_：《建塔者》，臺北：遠景出版社，1990年。
- \_\_\_\_\_：《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2001年。
- \_\_\_\_\_：《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書局，1989年。
- \_\_\_\_\_：《龍坡雜文》，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
- 劉納：《論五四新文學》，杭州：浙江文藝，1987年。
-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蔡源煌：《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臺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

蕭鳳嫻：《民國學者文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

戴寶村著，林呈蓉譯：《簡明臺灣史》，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年。

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顏崑陽：《莊子藝術精神》，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龔鵬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務，2005年。

# The mood and living way of Tai Jingnong in the high-pressure regime

Kua, Chin-chuan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 Jingnong as a case study. Explain early Tai Jingnong to Taiwan, his life and mind. Unlike 194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Taiwan with the mainland, three had been subjected to imprisonment by the communist suspicion Tai Jingnong, one yea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6) choose to teach in Taiwan. Originally believed that Taiwan is just a rest stop, but he did not expect under martial law, 40 years living in Taiwan. As the special nature of left-wing activists, the early martial law so he is in danger of Taiwan. Especially in the Xu Shouchang and Joe Dazhuang the incident, he hides a fierce speech. Apart from teach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ngaged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academic. But the quiet surface of him, whether the pressure inside the regime without any feelings. In addition to the martyrs and hermits, are there other attitudes do Tai Jingnong? In this pap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basis the creation of Tai Jingnong, discuss He In the high-pressure regime, his mind and attitude of life.

**Keywords:** Tai Jingnong, Xu Shouchang, Joe Dazhuang, Ji Kang and Ruan Ji

---

\*Part-time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